

论古蔺白沙会议的历史地位

张家德 程 昕

古蔺和省党史办对白沙会议作了广泛的多年调查与研究,在新著《红军长征在四川》中有这样五点表述^①:

1. “中央红军已在古蔺南部之白沙地域从容休息了两天”,“十五日,中革军委率直属队进驻古蔺县南部之白沙场”;

2. “是日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负责人于白沙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碰头会”;

3. “拟定了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行动计划。决定由临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然后分三个纵队向贵州桐梓地域前进”;

4. “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留在川滇黔边战斗的目的和任务,提高战斗信心,党中央、中革军委于十六日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中央之“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地区中建立根据地”的原因,一是川滇军阀全力拦阻,二是中央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经常转移之中运动作战,寻求有利时机与地区去争取有把握的胜利;

5. “为使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知道中央红军正在川滇黔边区作战,并相互呼应,军委亦于是日分别电告。”

以上五点内容,除《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并无“留在川滇黔边战斗”这一战略目标的史实之外,其它均是事实。这在白沙“碰头会”迄今并无文字记录材料,以及在各种版本的红军长征史中均是空白的情况下,确是古蔺和省党史办所作出的很大贡献。

然而,笔者却有近乎过份苛求的看法,认为上述五点内容还未能全面、深入地展现此次会议的真实内涵和历史地位。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启示下,试作进一步的深层发掘和考订,论证会议的丰富内容、性质和突出的历史地位,以共同充实、填补这一空白,谨于党70周年之际献给红军英烈。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红军长征在四川》虽然指出“中央红军在白沙地域从容休息了两天”,但只认为“十五日,中革军委率直属队进驻……白沙场”,“是日夜”中央负责人“举行碰头会”。

尽管会议没有文字记载,笔者从2月14日至17日的革命历史档案和革命文献中,并参照《红军长征在四川》之说,却另有见地。请先看下列材料:2月14日,朱德致林彪、聂荣

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有“军委直属队应由摩泥（尼）、黑泥（尼）哨分取白石岩、麻线堡两路进到白沙及其西南端地域”的记载。^②2月15日，朱德致一、三、五、九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③。16日下达向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中，朱德还有“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十七日七时由白沙出发”的说法^④。伍云甫《长征日记选》2月15日（阴）亦载“由黑泥（尼）哨经白石岩、石家河、百铺、侯山洞（经一大山）至白砂（沙）街上宿营。”16日则仍“驻白砂（沙）”，17日（阴、微雨）“九时由白砂（沙）出发……”。

上述材料十分清楚地表明中革军委率直属队于2月15日至16日在白沙宿营两夜。由于从1935年1月1日的猴场政治局会议起，已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做报告。”^⑤因此，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以来，许多政治局委员“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一般情况是每天到宿营地”，晚饭后都要召开一二十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使召开重要的遵义会议也是每天晚饭后举行的。因为中央领导人每晚都要等前方的电讯，常常等到后半夜。这就形成等到前方电讯立即开会研究军事问题的习惯。^⑥由此可见，根据猴场会议中央决议的规定和中央开会的习惯看，中央在白沙的“碰头会”，不只在15日召开，而且16日夜亦依然举行。

上述考订，我们可以这样确定：白沙会议的时间及地点，应是2月15日至16日，军委直属队在白沙宿营两夜时，中央在鱼塘湾崔家祠堂举行了“碰头会”。

（二）会议的四个重要内容

《红军长征在四川》说：白沙中央“碰头会”上只“拟定了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行动计划。”虽然提到了16日《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是日分别电告”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两个重要文献，却十分谨慎地并未提到它们是白沙会议的直接产物。笔者有根据地认为，2月15日夜至17日的军委电令与其它革命文献，构成了白沙会议所讨论的四大内容。这个看法能不能成立呢？我们不妨从下述四大内容分别进行剖析。

其一，在2月15日夜的会议上，中央再度确定了红军作战方针“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以及东渡后战术上的分进合击之行进路线的区分和作战手段，即“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铺地段过赤水，然后分（三个纵队）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至于三个纵队的区分：右纵队为三军团组成，由回龙场经丫叉、铁厂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取道赤水东岸的回龙场地域直往桐梓；中央纵队为军委及五、九两军团组成，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过河，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再定；左纵队为一军团组成，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相机占领土城后，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⑦

在2月16日夜的白沙会议上，讨论了各军团2月17日向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及其行动部署。即“基于十五日二十时电示任务”，各军团17日继续向林滩至顺江铺的赤水河岸前进，其行动如次：

A. 一军团应进到太平渡、石夹口地域，派一个先遣团附工兵连及电台，先赶到林滩、悦来场一带去控制渡河点，并架桥及向土城方向侦察、警戒。其后方部队应经回龙场、镇龙

山前进，并加强对古蔺方向的警戒。

B. 三军团应由现地经丫叉、铁场、进到龚家坝、柑子坡（鱼岔）地域，并侦察渡河点及对岸敌情和架桥。

C. 五军团应于17日11时由白沙出发，进到回龙场地域，向古蔺及末路警戒。

D. 九军团应于17日12时由白沙出发，进到养马嘶地域，向马蹄滩及末路警戒。

E. 朱、周率军委直属队17日7时由白沙出发，经养马嘶进到丫叉地域。⑤

按1932年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中央局电，虽然曾经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可是到了“三人团”执政时，已总揽一切。由于长征初期迭遭失败，损失惨重，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不懈斗争，1935年1月1日在重申黎平会议精神的猴场会议决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已有“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这就表明，由于政治局的直接干预，它对专断一切的“三人团”已有所制约；同时显示了军委对作战方针的制订和作战时间、目标的选择，均须报告中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方能决定。那么，大到军事行动方针和计划的制定，小到行军路线和时间的选择，自是更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了。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这种督导军事指挥、改善军委领导方式的职权更加突出。在一反过去“左”倾统治集团独断专行作风的这段期间，张闻天所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议上，无论作战计划和行动部署，都应在讨论之列。所以，确定17日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与向赤水河岸进军的命令，应是15日夜及16日夜白沙中央碰头会议上的中心内容。

其二，最为明显的一个革命文献，即党中央及军委签署于2月16日下达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⑦，向全体指战员及政治工作人员指出了以下内容：

（一）它解释了“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的两大原因：即“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

（二）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向全体同志指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是在革命战争的许多胜利中创造起来与发展起来的，但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这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三）“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中央指出必须具备三大优势：一是“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和避免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同时要发挥“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的运动战略战术，即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二是“百倍的加强政治工作，……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连队的纪律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三是“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取得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

(四)在阐述全国革命形势的同时,“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我们作战的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其三,2月16日军委分别向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下达包含以下内容的电示。首先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当)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出现了由川南不能北渡长江的两大客观因素:一是“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二是“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防堵”。这就“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由于党中央与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

“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①这类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相互配合”^②的重大指示,当然只能是由军委向党中央政治局以上级别的会议报告并讨论批准后方能作出,故这一重大决策应是白沙会议的第三个重要内容。

其四,为什么说2月17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工作指示亦是白沙会议的重要内容呢?因为自2月17日起,中央政治局同志已随军分三路东渡赤水,因此2月17日后的东渡期间,中央并未举行政治局以上级别的会议,故涉及大政方针的具有“大的转变”之政治工作原则,而以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名义于2月17日向各军团政治部下达的《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应是白沙会议通过的另一重要文件。它指出了“部队中严重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政治工作,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都表现得薄弱,不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的适合战斗环境去进行。”因此,对“这种政治工作的严重的错误与弱点,要求有迅速的大的转变。”如何着手转变呢?文件指出:

(一)“主要的是进行作战的鼓动,最高度的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的打胜仗。”要积极地 在连队中利用行军休息时间进行深入的解释与讨论,“特别要巩固在云、贵、川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了解只有以最大的勇气打胜仗消灭敌人,才能创造新苏区”;要了解现在的行军与作战,已经与过去不同,我们已经是在云、贵、川边的新的苏区范围中行动。现在的行军是为着作战消灭敌人,现在的战斗不是象过去的掩护战,而是要在每个战斗中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人。

(二)要求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散漫疲劳现象、军风纪松懈、有军阀残余等不良倾向加强教育,克服疲劳情绪,巩固部队;要求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要求提高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要求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等。还提出要 做好沿途寄养的伤病员的慰问,欢迎他们伤愈归队。

(三)重视开辟新根据地的工作。一是要求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要从新战士中选拔川滇黔边的积极分子予以随营训练,使其成为游击队的骨干及地方工作的干部,并从遵义、桐梓、土城及川南一带带来的游击队与新战士中,集中5⁰至100人组织游击队,配以有经验的军政干部率领,随时分派出去。三是要向黔北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阶级斗争的积极性。特别要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无情的镇压反动豪绅地主、民团团总等。公开抚恤遇难被害家属。深入连队,“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目前大量扩大红军的意义,自觉自动的争取行动,努力扩大红军。”还要求“搜集争取新战士的经验,随

改善新兵营工作。”文件深刻地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从胜利的战斗中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已迫切的放在每个政治工作人员的面前。”因此要求各军团政治部“紧张起来进行以上的工作”。

（三）会议的性质

《红军长征在四川》对白沙会议持“碰头会”的说法，给人的感受，很有毛泽东赶到白沙场，仅仅是与周恩来、朱德碰碰头，匆匆“拟定”了东渡赤水的“行动计划”。当然，所谓“碰头会”也可理解为并未确定会议的性质。可是，从所提到碰头的三位中央负责人，全是主管或分管军事的，即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军委主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分工“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兼军委副主席。^⑩这种论述方法，其言下之意是强调了军事问题，给人以“碰头会”的性质，大有军委会议的明显印象。

然而，通过前述会议内容的论证，白沙会议并非只是15日夜毛、周、朱等少数中央领导人碰碰头，而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内容不单只是东渡赤水的军事行动计划，还有战前发布动员令、红军三大主力呼应配合作战，以及对政治工作要求有迅速的大的转变的内容。这均涉及全国全军大政方针，绝非军委会议的职权范围。更何况中央已有明文规定，“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不但表明了讨论军事问题的这类会议，在这段时期是政治局会议的性质；而且由于有军委成员参加这类会议“做报告”，从而体现了这类会议的形式，是“党中央与军委”联席会议。再由上述会议的四个内容来看，尤其是中央及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其落款署名十分明确无误地肯定了是“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讨论决定后颁布的革命文献。由此及彼，因此我们有理由判定2月15日至16日在白沙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依然是政治局会议性质的“党中央与中革军委”联席会议。

（四）军委纵队基层会议与干部会议

据伍云甫《长征日记选》2月16日载：“驻白砂（沙）。在一分队驻地开机、报员会议，传达洛甫的报告及征求报务人员的意见。下午四时半听副主席的报告。”这则十分可靠的长征日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张闻天2月10日在扎西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传达的遵义会议精神，伍云甫根据纵队的统一布置，2月16日已把它传达到基层连队。它既表明军委纵队已完成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全部传达，又表明这一会议是军委纵队的基层连队会议。二是16日下午4时30分，伍云甫等干部又听取了军委副主席的报告，这个报告会无疑是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报告内容，就是当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动员东渡赤水，发起桐娄遵战役；报告人当是周恩来副主席。因为军委副主席只有两人，本该由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副主席来作这类政治动员报告的，但王稼祥自负重伤以来一直坐担架西征，行动不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长期已由李富春代理，而李富春这时又须处理向野战军下达《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这样，向军委纵队干部作战前动员的任务，自然落到另一位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身上。再说，象这类重大的战前政治动员，多由军委副主席级别以上的中央领导人担任，如中央红军在云南发起抢渡金沙江战役展开的战前政治动员，就是由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担任，可见中央对这类关键战

役是何等重视。

（五）白沙会议的历史地位

白沙会议2月15日制定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后，于2月16日又接连下达了2月17日的《行动部署》与《关于我军向林滩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直到桐（梓）、娄（山关）、遵（义）战役的进行，均“基于（二月）十五日二十时电示任务”^⑤。这就充分表现白沙会议揭开了东渡赤水展开桐娄遵战役的序幕。可见，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应始于白沙会议英明远见的运筹决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军委从当时战争环境实际情况出发，公开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十分突出而又准确地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大河滩、院子、扎西系列会议所确定的最新战略决策和行动方针，对红军全体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了十分广泛的动员。它既是动员二渡赤水河所颁布的动员令，当然亦是“为即将进行的遵义战役颁布的动员令”^⑥。尤其是它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军事路线仍受“左”倾干扰时，通过古蔺石箱子政治局会议的及时排除和调整，以及威信“鸡鸣三省”政治局会议建立的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三人中央领导格局后，已首次牢固地作为东渡赤水的桐娄遵战役中正确运用的战略战术与根本指导思想。红军在长征中从此沿着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最后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中央白沙会议决定电示红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呼应作战”，正是实践了中央及军委加强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密切红军三大主力的关系，“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⑦。因此，这一指示十分有力于进一步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的精神，而尤具全国规模“一致行动”的战略意义！^⑧

我们现在发现的遵义会议决议全文最早的刻本是2月16日，而伍云甫也在当天传达到部队基层。可见遵义会议决议，最早已开始于2月16日在军委纵队部队基层中首先传达、讨论并征求意见。这就是说，中央白沙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在白沙地域传达到红军基层连队中的时机已十分成熟，而且也很必要。结合《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在同一天颁布看，红军政治工作在白沙会议特别着重“要求有迅速的大的转变”是十分显著的。它高度概括地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举世闻名的精辟结论，延续贯穿于后来的十五年民主革命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保证我军的革命性质起着关键作用，因而在我军的建设上也是一个影响相当深远而具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另外，我中央红军能顺利东渡赤水，夺取长征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桐娄遵大捷，与周恩来副主席在白沙2月16日下午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的这一战前政治动员不无关系。为促使部队中过去“主要的由于政治工作，无论在战斗动员方面，在巩固部队方面，都表现得薄弱，不深入，不紧张，不能灵活的适合（应）战斗环境”的严重现象根本改观，首先在军委纵队就应该“有迅速的大的转变”。因而周恩来这一战前政治动员报告，其重大作用和显著意义“主要的是进行作战的鼓动，最高度的提高战斗情绪”，能动地建立“一定要有把握的打胜仗”的信心。并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完全充分“了解只有以最大的勇气打胜仗消灭敌人，才能创造新苏区。”

综上所述，夺取长征以来第一个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桐娄遵战役大捷的序幕在白沙会议揭开，标志着长征以来毛泽东军事思想首次正确地运用于大规模的实战——与蒋黔之敌决

战,并牢固地作为我军战略战术的根本指导思想。遵义会议精神以及包括遵义会议历史时期补充和发展阶段的古蔺(石箱子)——威信系列会议之战略决策原则与战略行动总方针,均由中央在这里开始向全军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公开发布传达、动员。而党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又在白沙政治局会议上予以确立,红军政治工作开始了带有根本性的“迅速的大的转变”。这一根本转变,对党和红军的政治工作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并且它还首先体现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于2月16日下午白沙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政治动员报告的表率上。所以笔者认为遵义会议历史时期由此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遵义会议总结和完成阶段^⑮。那么白沙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处于这个总结胜利和胜利完成遵义会议伟大任务的起点上,其历史地位当然应在党史——长征史上闪烁着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39—40页。

②朱德《关于我军十五日行动部署》,1935年2月14日23时。

③⑦朱德《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1935年2月15日20时。

④⑭朱德、周恩来《关于我军向林滩赤水河岸前进的命令》,1935年2月16日24时于白沙。

⑤《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1日。

⑥参见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伍修权《历史转折性的遵义会议》,《原毛主席秘书黄有凤访问记录摘要》。

⑧参见朱德《关于我军二月十七日行动部署》1935年2月16日;及④。

⑨《周恩来年谱》223页。

⑩原件名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⑪参见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10—311页。

⑫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2月8日。

⑬参见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⑰参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68页的“注”。

⑱红军国家战略,指工农割据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目标、战略设想及对反“围剿”战争的指导。

⑲笔者认为,遵义会议有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包括酝酿与准备阶段、会议召开阶段、补充和发展阶段、总结与完成阶段。而总结与完成阶段,则起于古蔺白沙会议,止于云南巧渡金沙江入川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上接第25页)

编》下册,第278页、161页。

⑭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二卷,69页。

⑮洛甫《苏维埃工作的改善与工农检察委员会》,《斗争》第37期。

⑯《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65页。

⑰《轻骑队通讯》,分别载1933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和1934年1月1日《红色中华》。

⑱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和3月29日《红色中华》。

⑲《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总结》,1934年2月20日《红色中华》。

⑳㉑《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163页,344—345页,312页。

㉒《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叫一切贪污腐化分子从苏维埃里滚出去》,《红色中华》1933年5月2日。

㉓项英:《零都县检举的情形和经过》,见《红色中华》1934年3月29日。